2016 年第 2 期
（第 15 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熟人社会”中的农村阶层关系

李 婷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将熟人社会作为农村阶层研究的微观场域，具体地分析阶层之间的互动和作用机制，把握阶层之间的关系状态和性质。在信息对称的熟人社会中，村民在不断地交往中形成阶层认知和阶层定位，而熟人社会中的公共性以及内向价值所产生的强制性使得阶层之间形成长期而稳定的互动，因此，阶层关系的机制性研究在熟人社会中得以实现，农村阶层研究的关系论范式在这一熟人社会中同样得以实现。

关键词： 熟人社会；阶层互动；农村阶层关系；交往惯习；信息对称；公共性；价值吸引力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6)02－0062－10

一、引言

在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在经济上维持着一种扁平化的状态。建国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地改变了农村中原本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化结构，使得农民相对均质化的占有了村庄中的资源，之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使得村庄中的分化进一步压缩，整体的村庄作为一个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村庄，在国家的整体性控制之下，个体的差异往往只是体现在工分上，而这种差异并不十分明显，村庄中的精英往往将自己超出于一般水平的能力禀赋用于公共事务上。当时国家对于市场以及人口流动的控制，使得农民很少流动到村庄之外参与到市场之中，这些都抑制着村庄中的经济分化，使得村庄在经济上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结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分田到户，分田到户之后虽然土地依旧是均质化的占有，但农民开始进入市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民之间开始出现了比之前较为明显的分化。随着市场化以及城镇化程度不断加深，村庄的经济分化不断扩大，村庄中开始出现阶层，进而形成阶层结构。

在农村逐步城镇化以及市场逐渐向农村渗透的背景下，阶层逐渐成为理解当下农村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一背景下，农村阶层关系的研究符合当下中国语境。中国当下的很多农村正在或即将进行城镇化建设，农民不仅主动进入市场，市场也逐步渗透进农村，将农民纳入市场体系中，农民的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也在市场中被激活。村庄开始出现明显的经济分化，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中，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结构。所谓阶层分化结构，即村庄中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层之间在职业上以及与之相关的收入水平上存在一定的边界。在这一阶层分化结构下，阶层关系对村庄政治、社会关系的影响势必越来越大，因此研究当下农村的阶层关系是符合城镇化、市场化进程这一中国语境的。而中国语境还体现在城镇化以及熟人社会中，也就是说阶层分化的场域是熟人社会。从传统和现代的话语来讲，熟人社会中的分化展现的正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相互作用。不论是分化已完成的东部村庄还是分化正在进行的中西部村庄，在注重“关系”的中国，大部分的村庄依然还具有熟人社会的性质，因此在熟人社会中进行阶层关系

收稿日期： 2015－11－23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16.02.0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14JZD030)

作者简介： 李婷(1989—)，江西吉安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E-mail：hzlilitg@163.com

研究也是一种呼应中国语境的阶层分析。

(一)农村阶层研究的实体论范式

当前的农村阶层研究在实体论和关系论两大范式下展开,但又偏重于前者。实体论将阶层当作一种既定结构,着重于社会系统中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构成方式和比例关系,它依据某些特定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对社会成员的阶层归属给予划分,从而确定各个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其主要进行阶层结构的研究,更加注重宏观分析,整体把握阶层分化的状况[1]。

总的来说实体论偏重于对阶层进行静态的描述性研究,大量针对阶层结构的整体性研究主要围绕阶层划分的标准,社会的阶层构成,每个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每个阶层在社会中的特点,从而判断阶层分化的状况和特点[2],进而对社会结构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判断,比如断裂的社会[3]、倒丁字形结构[4]等,再结合社会结构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还有大量的研究是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针对某个单一的阶层进行定量的统计以及定性的描述,如农民工群体[5]。还有的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从社会结构的层次下降到个体心理的层次,分析阶层的心理、态度及认知等[6],事实上这一类研究也是在既定社会结构下对阶层进行描述性的分析。

实体论范式从社会整合的视角,以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为基础,采取一种相对保守的功能主义立场,强调阶层之间的包容性,模糊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避免阶层之间的冲突。改革开放之后,阶层分析出现了偏重于实体论的倾向,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出现,正是因为之前经历了阶级斗争。实体论的这一保守的而不是激进的,整合的而不是冲突的价值立场使得自身成为了当时人们更容易接受的研究方法。因为经历了剧烈的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似乎成为了一种具有攻击性的话语体系,社会各界对于阶级话语都非常敏感,学界在阶级研究方面也经历了一段去阶级话语的过程。阶级研究逐渐向阶层研究偏重,学界整体性地从马克思所倡导的阶级的经济决定论转向韦伯所提倡的多元分层理论。阶级分析被意识形态所笼罩,一些学者甚至质疑其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遍地被学界冷落。

(二)从实体论到关系论的转向

阶层研究的实体论偏重使得阶层研究基本上局限于静态的描述性分析,仅仅从类型学的意义上解读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分析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各种要素。这种单一的研究使得阶层研究生命力的迸发受到影响,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过去的经验和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和反思,认为现有的分层研究缺少对阶层之间进行关系性研究,只适合于分析社会的“表层结构”[7]。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范式为人们所认识,并且鉴于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阶层冲突以及底层抗争频发的社会事实,学者认为只有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才能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做出更加具体的动态的解释。因此在阶级阶层研究上开始出现了由实体论范式向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基础的关系论范式的转向。

阶级分析是基于冲突论,对于阶级形成的解释集中于权力资本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重视权力剥夺和底层抗争。其所讲的阶层阶级是关系性的,强调不同的阶级阶层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等。只有在阶级互动中才能发现和解释[8],这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韦伯的阶层分析的一个重要差异。而阶层研究的关系论范式正是基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关注阶层关系性质与状况。同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又决定和形塑阶层结构的性质与状况。实体论阶层研究的对象是单个的、没有关联、互不发生作用的阶层,平铺在社会结构中。关系论阶层研究的对象则是处在结构中不同位置的阶层,其等级序位是在交互关系中形成和体现的,只有在阶层关系中才能区分主导阶层、次要阶层及依傍性阶层,对于整体结构才会有轻重缓急之分。只有在阶层关系中,阶层结构的系统才能够得到灵活地呈现,才能发挥整体大于部分的功能。而实体论研究的单个的僵化的阶层则难以形成系统,不能把握阶层的整体效能[9]。因此,阶层关系是

激活阶层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阶层之间的关系研究意味着对不同阶层之间进行组合研究,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互动模式,由此产生不一样的阶层互动机制,形成不一样的社会结构,为阶层研究提供了丰富性和广阔的空间。

在这一研究趋势下,学界基于阶层研究的关系论范式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推进体现在一系列具有关系意味的概念上面,如阶层区隔,阶层分化与人情排斥。而从类型上来说,阶层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种是总体性的阶层关系研究,包括农村阶层关系的理论研究、农村阶层关系性质的总体性判断[10-11],农村阶层关系[12]的经验研究则主要是在村庄中,集中于富人治村[13-14]、隐形农业革命[15]、农民上访与阶层对抗[16]等主题。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层面,学界对农村阶层关系已有一定的研究,但阶层关系的理论问题尤其是理论与经验结合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三)熟人社会作为阶层关系的研究场域

本文从以下方面对农村阶层关系的研究做进一步地探讨:一是关于农村阶层关系的经验与理论研究在什么场域中达成一致,二是关系论范式在经验中如何实现的问题。关系论范式以阶层关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阶层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是对其进行理论探讨的前提,但是在什么地方进行阶层关系的经验研究,在什么地方能够实现阶层研究的关系论范式呢?

杨华在对农村阶层研究关系论范式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村庄是阶层关系研究的理想场域。因为村庄作为一个微型社会,其内部生产、生活、信仰和社会关系自成一体,村庄不仅是逻辑自洽的领域,即在村庄内部各类现象相互关联,互为因果。而且村庄现象具有结构易得性,即如果研究者置身与其中,便能触摸和体验到农民个体、群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勾勒出村庄详细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事件的脉络,甚至可以体悟到农民的内心世界。对于农民分化的研究亦是如此,若没有村庄微观经验的感受,便不能真正把握村庄关系的实质,农民分化的程度以及主观的社会分层,也就不能判断农村是否存在阶层分化以及哪些农民应该归入哪类阶层[17]。

在承认村庄作为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一个理想场域的前提下,着重点在于村庄作为熟人社会这一特征对于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意义。熟人社会作为村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阶层互动以及阶层之间发生关系的重要条件。如果说村庄为研究阶层关系提供了一个理想场域,那么对熟人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研究则是解决阶层关系为什么能够在村庄中生成的问题,阶层之间怎么产生互动,又是如何互动的都是对这一问题解答。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分化的村庄这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一场域中不同阶层的农民是如何形成阶层认知、阶层定位以及阶层互动的。而只有在这个过程中阶层之间才发生了关系,这样才能研究阶层关系,才能为阶层研究的关系论范式提供一个实现空间。

二、阶层分化下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是村庄的一个重要的性质,也是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熟人社会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作为村庄的关系基础,通过人情往来以及由此产生的面子、信任、规则以及自己人的认同使得村民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熟悉进而亲密[18]。结合既有的研究以及笔者自身的理解,认为熟人社会是一个具有公共性或强制性的、具有价值吸引力的、信息对称的社会,而阶层分化的熟人社会仍然保留了这一特称[19]。以浙东 D 村庄为例,在具体的村庄场域中分析阶层分化下的村庄作为熟人社会有哪些特征,在这些特征的影响下,阶层关系在熟人社会中是如何发生的。先对熟人社会中的分化状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就熟人社会进行分析,回答什么是决定熟人社会的关键变量,这些变量是如何影响阶层关系的形成。

(一)阶层分化

D 村是宁波市的一个城郊村,因为地少人多,再加上实行两田制,80 年代人们开始大规模的进

入市场,村民能力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在市场中被全面激活。D 村总共有 300 多户,村庄中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村庄中主要分为四层,包括富人阶层,年薪 100 万以上,部分拥有资产价值几千万元的企业,D 村中大概有十几户。中上层年薪 20 ~ 100 万,主要经济来源是承包工程等,这一个阶层占 10%。中层年薪 10 万左右,一般家庭中的劳动力都在企业里面上班,一个月收入 3 ~4 千元,约占村庄总人口 60%。中下层则主要是一些家庭劳动力少,劳动力资质较差,且负担较重的家庭,一年收入 3 ~4 万,约占 8% ~20%。特别穷的人只有少数几户,不超过十户。他们往往不仅收入少,而且还有大量的负债。

表 1　D 村阶层分化状况

	政治参与	社会关系	居住情况	公共参与	消费状况
富人阶层	政治参与积极性高,但由于本阶层人员忙于企业事务,缺乏参与村庄政治事务的时间,但又希望拥有村庄政治身份,于是通过其他家庭成员来参政。	积极维系村庄中的人情往来。村外社会关系相对比较广。办酒时的酒席数量为 40 ~50 桌。	一般长期在外居住,在村里建有豪宅,偶尔来居住。	祭祀活动的捐献与其他人相对持平,一部分会进行教育捐助。很少参与村内公共活动。	不在乎村内消费水平,不在村内打麻将,打麻将的金额可达几十万,拥有数辆车,酒席花费可达上百万。
中上层	政治参与度更高,尤其是承包工程的村民,利用村干部身份能直接获利。因此较为积极的参与村庄政治。	更加注重维系村庄内部关系,村外关系较多,但相对富人群体外向的社会关系弱。办酒时的酒席数量为 30 桌以上。	一般长期居住在村内,在村内建有别墅(四层)。在村外也有房子。	公共生活参与相对较多,会参与广场舞和祭祀等公共活动。	对村内消费水平、消费趋势较敏感。很少在村内打麻将,打麻将的金额可达几万元,酒席消费为 2000 元以上/桌。
中层	政治参与度低,消极参与派系斗争,作为上层的关系资源参与其中,根据与上层的关系分享利益。	主要是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和工作单位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村外关系资源较少。办酒时的酒席数量约为 25 桌。	居住在村庄之外,村内多建有房子(两层)。村外没有房子。	公共生活的参与主体,多为参与打麻将、广场舞、祭祀等。	对村内消费水平不太敏感,消费水平一般,在村内打麻将,打麻将的金额为几百到几千。酒席消费约为 1500 元/桌。
下层	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消极参与,用自己的选票换钱。一种是以上访的形式积极参与。	村庄内的社会关系少,村外关系几乎没有,办酒时的酒席数量为 10 桌以上。	在村庄内居住,一般建有房子(两层)。	很少参与公共生活。	没有能力在乎村庄的消费水平,在维持基本的生存的前提下,尽量办酒席和少走人情,酒席消费为 1000 元以下/桌。

(二)信息对称

传统熟人社会中的村民既熟悉又亲密,“通过脚步声就知道来的人是谁”[18]是熟人社会最形象的刻画。村庄的阶层分化没有带来村庄的陌生化,在大部分东部沿海的发达农村,阶层分化日益明显,但是大多数村庄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村民对彼此之间的信息有充分的认知。在熟人社会中信息对称如何实现,这就需要信息在村庄内部进行充分全面的扩散。

信息的扩散首先是通过熟人社会中亲疏关系及其重叠分布而得到扩散。信息的传达往往是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但村庄内部的亲近关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每一个人的认同体系总是和别人的认同体系交叉重叠,而交叉重叠的部分则是信息在村庄内熟人网络中流通的关键。如A是个体的妻子,但是A又是B的妹妹,那么个体和B的信息通过A达成了共享。村内通婚甚至是族内通婚促使这种认同关系更加复杂,重合度也越高,这就使得信息传达愈加充分。其次,村庄内部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熟人社会空间的平面性和开放性使个体的信息在这个平面空间被全面的展示和观看。在城市社区,居民分布在立体空间中,而且一扇门就能够将个体的信息转化为隐私封闭于门内。

不仅社会关系的重合程度和物理空间本身的开放性能够促进信息的交流扩散,社会交往的密度也能对信息的扩散产生影响。交流信息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实现方式,同时也是社会交往的一种结果。聊天是村民交往的重要内容和方式,聊天的过程中就是信息分享的过程,并且通过信息的分享加深彼此的关联。信息共享使得彼此之间的公共知识更加完善,彼此的关联也就越深。除了聊天以外,一般的交往行为还包括礼物的交换和互助等,这些行为本身就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交往行为本身就达成了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因此社会交往密度越大,村民彼此之间的信息就愈对称。这些交往不仅包括人情往来这种较为正式的社会交往方式,还包括日常的闲聊串门等非正式的交往方式。

笔者调研的D村内部是一个较充分的熟人社会。村庄中的村民依旧住在传统的落地房,村民居住的密度较高。其次村内婚姻甚至是族内婚姻较多,姻亲和宗亲在村庄内部交错。再加上村庄的社会交往较为频繁,除了一般的人情往来以外,关系较亲的村民尤其是姻亲之间也会走门串户,邻里之间会一起去散步、打麻将等。这些条件都有利于信息在村庄内部的流通与共享,使村民称彼此为熟人,实现信息在村民之间的对称性。

(三)公共性:村庄中的社会人

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内部个体间的熟悉、信任、亲密,信息对称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信息对称更多作为熟人社会的结果状态,信息对称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是熟人社会中的公共性和价值吸引力这两种力量在起关键作用。公共性作为熟人社会的一种力量,包括具有公共性的活动、规范和共识以及与此相关的仪式。其作为一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对个体的、私人性的、不符合村庄规范的行为进行压制,从而达成对村民行为的规约。如果有人打破了公共规则,基于规则的认同而产生的舆论会对其进行惩罚,从而保证规范得以维系,村民按照公共规则行事。

如果村庄没有公共性力量,那么个体性就会全面释放。个体性的释放有两种方式,一种以冲突的方式呈现,很多个体性的利益在村庄中全面的爆发,村庄成为逐利场,成为丛林,“为了钱,不讲面子”。在一些没有竞争秩序的地区,原本具有互助性质的人情都成为了村民之间逐利的工具,“杀一头猪也办酒,办酒就是为了挣钱”。一种以退出的形式呈现出来,因为没有公共性的力量,个体性爆发,个体可以全面的退出村庄公共生活,退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没钱办酒就不办,没钱就没有面子可讲”。无论是个体化的利益恶性竞争还是个体全面退出村庄,村庄中的村民都是以个体的身份来活着的,村庄中没有公共性,因而不顾及村庄的公共利益也缺乏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规则。全面的个体化之后便是逐渐的陌生化,村庄中的个体区隔会不断的扩张,个体之间的空间距离与情感距离都会被不断拉长。这一状况在原子化的村庄表现的很明显,在这一类没有公共性的村庄,熟人社会在村庄内部难以维持,因为没有公共性的村庄无法实现熟人社会的再生产。

因此熟人社会要避免陌生化,就要求村庄具有公共性,对人们的交往进行规范,并且对个体化的行为进行约束,阻止熟人社会中的村民随意的进入和退出村庄的社会交往。因此熟人社会中,

村民的往来尤其是人情往来受公共性力量规约,个体性的利益表达要服从公共规则。而在 D 村,一些村民尤其是底层没有能力跟上村里整体的办酒形式的甚至是没有能力走人情的,也不能从个体利益出发,不参与村庄中的人情,因为如果他们退出村庄中的人情的话,就会“做不了人”,也是他们不得不参与村庄人情来往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 D 村还具有公共性力量,可以避免考虑个体利益的村民退出村庄的人情往来,村民在村庄中要做一个“社会人”。而村民之间在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力量面前维持稳定的人情往来,使得熟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再生产出来。

(四)价值吸引:村民生活面向的内向性

村民生活面向的内向性,即村民价值实现是指向村庄的,意味着村庄对于个体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吸引力,村民是朝向村庄生活的。村民朝向村庄生活意味着村民在乎村庄中的其他人,希望自己的成就为这些人所看到,希望这些人能够给自己肯定的评价,个体在这种肯定的评价中感受自己的成就与价值。村庄的公共性之所以具有强制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村庄中村民生活面向的内向性。如果村庄内部不作为一个个体价值实现的标的物,个体就不会在乎村庄中人的评价,村庄的公共性就没有办法对个体产生影响。在原子化的村庄,村民的价值面向是朝向村庄之外的,村庄只是一个跳板,他们最终是要在城市生活的。他们不再在乎村庄中社会性以及价值性的自个体实现,不在乎同村人的评价,村庄舆论就难以发挥作用,更谈不上依靠集体行动来压制个体,个体性的爆发在所难免,村庄公共性就难以实现。再加上这种生活面向的外向性使得个体不在乎村庄,这种不在乎也会导致人们对于村庄中个体的信息的不在乎。村庄中获取信息的前提是人们在乎这些信息,在乎信息的发出者——村庄中的人。如果不在乎人,那么信息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信息就仅仅是信息,不会转化成情感关联等其他东西,因此在这样的村庄中信息对称也难以实现。这些都会影响到熟人社会的维系。因此,生活面向的内向性同样也是熟人社会的基础,是村庄公共性力量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信息对称实现的重要前提。

在 D 村,村民大都还十分在乎村庄内部的评价,无论是哪个阶层。即便是常年生活在外的富人,他们也会尽量在村里办酒,而且办的尽量隆重,即便一直住在外面也要在村里建一栋豪华别墅,偶尔回来住个一两晚。中下层的村民即便人情负担非常重,一年的人情开支占到收入的一半,但他们还是会努力去经营自己的人情关系。正是因为他们在乎村庄内部的评价,希望得到村庄内部的肯定,在村庄内部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和有价值的人。

总的来说,大部分东部村庄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特征,虽然背后的秩序基础、规范和价值以及主导规范和价值的主体都在发生变化,但仍然维持着一个基本的熟人社会的形式与秩序。

三、熟人社会中阶层关系的形成

阶层关系的形成要以阶层中的个体自己形成认知为前提,只有阶层中的个体对阶层位置形成认知,对村庄整体的阶层结构有所认知,个体才能感受到阶层结构的力量,才能从结构中定位自己,才会从自己身处的阶层出发参与村庄的社会互动,自在阶层才会转化为自为阶层。阶层认知又要以阶层互动为前提,而且只有持续稳定的阶层互动才能保证分化村庄中的村民形成充分的阶层认知。而且只有稳定而持续的阶层互动,阶层之间才会发生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关系,阶层关系的研究才能够实现。而只有在熟人社会中,在一个信息对称以及具有公共性和具有价值吸引力的熟人社会,才能形成阶层定位和阶层认知,才能形成稳定而持续的阶层互动,才能实现对阶层关系的机制分析。

(一)阶层认知:从“自在阶层”向“自为阶层”的转换

马克思认为,依据客观经济指标划分出的阶级被称为“自在阶级”,即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

着的阶级群体,当这些阶级的成员意识到了自身利益(阶级利益),并为追求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阶级行动),“自在阶级”就成为“自为阶级”。对阶级进行自在与自为的区分主要是从阶级动员的层面而言的[7]。本文对于阶层进行类似的划分则是从阶层认知的层面出发,即便没有阶层动员,阶层中的个体在熟人社会这一场域能够形成阶层认知,对阶层形成认同,阶层也能够从一种自在阶层转化为自为阶层。这也是相对于陌生化社会而言,因为在逐渐陌生化的村庄中,熟人社会的性质也在逐渐消解,村民之间难以实现信息对称。这样的村庄即便存在阶层分化,个体在其中也难以对自己所在阶层中的位置形成认知,阶层之间也不可能会形成稳定而持续的互动。阶层往往只是作为一种自在阶层而非一种自为阶层而存在。

在信息对称的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对彼此的信息有充分的认知。村民可以通过观察一些现象,通过与其他人的闲谈中了解到一些看不到的信息,还可以从亲人和密友之间的交谈之中了解到一些更为隐秘的信息,对村庄中的大部分村民的信息有一定的认知,进而从各方面对自己所在的村庄的经济分层状况进行了解。比如通过个体的收入、家里的装修、酒席规模等指标,个体就能够较为充分的定位自己在村庄中的经济发展状况,对自己在村庄中所处的阶层位置形成认知。在和村民访谈的过程中也能发现,村民对村庄有多少富人,谁家经济实力怎么样,自己属于哪个水平的都比较清晰。因此在熟人社会中,通过不断的不同深度的交往和互动,阶层能够实现一种从自在阶层向自为阶层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对自己的所处的阶层进行定位、形成认知。

(二)阶层互动的实现

阶层之间持续稳定的互动才能保证阶层之间发生稳定可预期的关系,这也是阶层认知实现的重要条件。阶层之间如何在村庄内部进行持续稳定的互动,需要村庄本身有一种强制性力量。这种强制性力量首先来源于熟人社会的交往惯习,其次来源于村庄中具有强制性的人情往来规则,这背后都是需要公共性力量以及价值吸引等作为支撑。而分化村庄中有新的价值生产,因为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具有价值生产的能力,这里新的价值促使人们对阶层形成认同,包括对自身所处的阶层以及作为这一阶层的人应该如何行为形成认同,并且也对其他阶层形成认同、这一力量不仅促使着阶层分化的村庄中不同个体进行持续稳定互动,而且是进行具有阶层性质的互动。

1 熟人社会的交往惯习

阶层互动要发生,刚开始往往混杂着熟人社会交往惯习的力量。惯习作为一种村庄的共识能够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共识本身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认同,村民都认为要进行交往,要走人情,不这样做就不符合大家的共识,不符合村庄的习惯。惯习的力量在村庄传统价值失落以及村庄内部的交往没有必要之后更突显。人们可能觉得交往本身也没有什么价值性的东西产生,也不是为了能够通过交往来获取帮助。在D村,村庄内部的村民之间很少进行互助,借钱甚至贷款也大多都不在村内进行。习惯交往依旧是很多人进行交往和互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惯习还作为一种社区记忆,烙印在个体的意识与行为中,作为一种无反思的力量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促使人们依照交往的习惯进行互动,即便在阶层分化的村庄依然是如此。

而熟人社会的交往惯习作为一种力量,在大部分村庄都会有所保留。即便在原子化的村庄,人们的交往中也有惯习的话语。但是这种惯习的强制性往往没有那么强,村庄中没有公共性以及价值性的力量支撑,舆论早晚会消失,共识早晚难以达成。而且在理性计算面前,履行交往惯习是有成本的,无反思的惯习早晚会被反思,伴随着社区记忆被冲淡,惯习被改造。

2 强制性的人情往来

因此,阶层之间进行持续的稳定的互动,还是需要强制性的力量来支撑,对于人们的交往进行约束并形成一定的规范,达成共识,通过公共性力量来约束阶层分化村庄中的个体,使得阶层社会

内部形成稳定持续的交往与互动。“不交往就做不成人”这一强制性力量依然在影响分化的村庄社会,参与仪式性的人情往来对于村民来说是不得不完成的,因为这关系到村民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村庄社会人。但是这种力量只是一种话语,即便参与这些仪式性人情往来,个体也不一定有价值。和扁平化的有结构的宗族性或者小亲族村庄不一样,村民通过参与人情并且举办和自己人生任务有关的几个重要的仪式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就能做一个合格的村庄社会人,他的人生也就变得有意义,而且这些都是根据个体的经济实力并且在个体能承受的前提下完成的。但是在分化的村庄中,虽然村民在村庄中也参与人情往来,也办酒席,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经济实力的差异,完成人生任务本身不再生产价值,经济实力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对于那些经济实力较差的中下层尤其是底层来说,价值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办酒席的标准已经被上层以及中上层划定了,只有按他们的标准办酒席才是有价值的,或者说要以尽量接近他们的规格办酒席才是有价值的。没有能力的中下层和底层即便举办了酒席,甚至在超过自己经济实力的范围内走人情以及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他们依然没有办法通过这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没有办法做一个合格的村庄社会人。

因此通过“完成人生任务来做人”只是分化的熟人社会中的一套话语,背后实质性的、支撑性的传统价值已经丧失,其作为一种传统的话语为新的结构性力量所利用,使得村民不得不参与村庄的阶层互动。这一传统的价值话语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的结构以及价值生产机制已经被击垮之后重新被激活利用,主要在于新的结构性力量,一种具有价值生产能力的阶层结构在起作用。这一阶层结构通过生产新的价值,来强制阶层分化中的村民参与到人情往来之中,即便有一些人比如下层以及底层并没有能力参与其中。但不论是传统价值还是新的价值,阶层分化的村庄依然具有熟人社会的一个特征,即村庄内部是有价值吸引力的,这种价值吸引力是公共性以及信息对称的重要条件,也是强制性的人情往来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撑。并且只有在依然是熟人社会的前提下,阶层分化的村庄中稳定和持续的阶层互动才有可能实现。

3. 阶层结构:新价值的生产

在阶层分化的同时具有熟人社会性质的村庄中,强制性的人情交往背后有一种不同于传统村庄的结构性的力量在起作用,而这一新的结构性力量是什么,它又是如何通过生产价值来实现一种强制性? 这一新的结构性力量就是阶层结构。村庄中有不同的阶层,从表 1 能够看出,虽然阶层之间的边界并不在一个明确的量上进行数学意味的划定,但基本的阶层梯队结构还是很明显。在这一结构中,主导性的阶层是富人阶层和中上层,即便他们在村庄中并不是大多数。在阶层分化的村庄中并没有传统的价值来抵抗市场价值的进入,在传统价值还发挥作用的地方,声望经济会抑制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同,很多逐利行为尤其是个体的逐利行为往往被视作卑贱的。

但是在 D 村,由于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依赖以及村庄内部的声望经济并不起作用,市场价值很快就被接纳了。而在阶层分化的村庄中,富人以及中上阶层是市场经济中的胜利者,他们在市场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在接纳了市场价值的分化的村庄社会中,在经济以及社会价值层面占据高地。他们不满足于在市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他们发现村庄中有新的利益可寻。大部分阶层分化的村庄,村庄内部往往有大量的利益。尤其是村干部身份对于富人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能够依靠这一身份获得更多的利益,比如依靠村干部身份获得政府的贷款或者增长自己的社会资本,富裕阶层会积极的参与到村庄政治中来。因此在自治的村庄中,富人要想获得村干部的身份,就需要获得村民的认同。富人以及中上层通过派性斗争参与到村庄的政治事务中,而且为了更便捷的获得这一身份资源,他们还进一步的参与到村庄的社会事务,比如利用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源以节省获得政治身份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富人以及中上层开始主导村庄

中的人情往来,他们按自身的经济实力来办酒席、走人情、不管中下层以及底层有没有能力跟得上。他们彰显自己经济实力的过程事实上是获得中、下层认同的过程。村民认同市场价值,认为能挣钱、能消费就是有价值的,因此那些能挣钱的个体所主导的人情往来规格就成为了他们模仿和追求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富人及中上层就主导了价值的生产,而且一套新的价值生产模式出现了。富人以及中上层的行为模式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消费模式成为了人们的消费标准和行为标准,而且人们只有通过模仿或者超越其消费水平才能够获得价值。

因此在这一阶层结构中,新的价值生产出来了。为了实现这一价值,人们就不得不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在村庄中展示自己的经济价值。而且不得不努力按照富人以及中上层的标准来完成人情交往,因为只有这样,你在村庄中才是有价值的。因此新的价值衍生出了新的强制性,这一新的强制性力量使得人们开始对自己以及对整个阶层结构形成认同,按照主导阶层所树立的标准来行为,被强制着参与到村庄中的阶层互动之中。

四、结论与反思

在阶层分化的村庄中,村庄仍然具有熟人社会性质,依然具有信息对称、公共性和价值吸引力。信息对称使得人们对自己以及整个村庄的阶层状况形成了认知,并且在熟人社会传统的交往惯习以及新的市场价值所产生的强制性力量的影响下,阶层之间以及阶层内部形成了稳定而持续的互动。因此阶层之间才能够形成稳定和可期待的关系模式,阶层关系的研究才能够深入实质,才能克服实体论对于阶层进行量化研究的倾向,才能够对阶层关系进行更加微观和中观的机制分析。因此熟人社会是阶层研究的实体论范式转向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场域。

(一)陌生化社区中量化的阶层概念

在陌生化的社区,个体的信息是隔离的。这种隔离体现在立体化的居住格局中,在村庄中,人们的居住格局是平面化的,一打开门就能见到。但是在立体的楼层中居民没有办法在一个平面观看,而且很多信息都被一扇门关于其内,很难实现信息对称。而且现代化的社区中除了单位制社区以外,社区内部的人交往是非常有限的。首先社区本身不像村庄一样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依托地域关系发展壮大而来,而是一种市场化的组合,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难以实现,大部分社区成员之间只限于点头之交。在这样的社会中居民之间没办法了解其他人以及整个社区的经济分层,也没办法了解自己的经济实力在社区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个体的阶层定位可能只能通过政府的信息统计在一个大的社会中定位。但是大的社会中的阶层往往就是一个量化的概念,因为这样的阶层定位往往在大的社会话语下通过阶级来诉说,阶级的互动在一个大的范围内通过几个掌握话语权的代表来实现,而且这种互动更多的局限在话语层面,因此在大社会中的阶层分析很难精细化和复杂化,往往是在宏观的层面展开。因此在陌生化的社区中阶层也大多是一个量化的概念,阶层关系以及阶层互动所带来的丰富性在陌生化的社区中难以被发掘。

(二)熟人社会中阶层关系的机制性激活

分层社会同样作为一个微型的熟人社会,村民能够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在高密度的交往情况下实现阶层认知、阶层定位并实现阶层认同与互动。阶层概念在熟人社会中一下子就得到了激活。在作为熟人社会的村庄这个相对封闭的、具有有限空间的场域中,能够更好地进行阶层操作,并且更加具象的观察到阶层之间的互动机制。阶层之间在稳定和持续的互动过程中,会形成稳定的可预期的阶层关系模式,也能够对阶层关系模式进行机制分析。因此熟人社会不仅能够作为阶层研究的关系论范式实现的场域,同时还能够进一步研究阶层之间在不同领域的关系模式,比如竞争性消费是如何形塑阶层关系的,阶层之间在治理层面是如何互动,进而如何影响村庄政治,甚

至影响整个县乡村治理体系的。总的来说,在熟人社会这一场域,阶层关系的研究活力也得到充分的激发。

参考文献:

[1]杨华. 农村阶层研究的范式论纲:实体论与关系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1 – 17.
[2]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J]. 江苏社会科学,2003,(4):1 – 9
[3]李友梅,孙立平,沈原.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李强. “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 社会学研究,2005,(2):55 – 73.
[5]朱力. 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版),2003,(6):41 – 50.
[6]李春玲. 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J]. 江苏社会科学,2004,(6):108 – 112.
[7]仇立平. 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J]. 社会,2006,(4):23 – 42.
[8]冯仕政. 重返阶级分析? ——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J]. 社会学研究,2008,(5): 203 – 228.
[9]杨华. 农村阶层研究的范式论纲:实体论与关系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1 – 17.
[10]杨华. 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 人文杂志,2013,(4):108 – 116.
[11]周晨虹. 近年来关于阶层关系问题的研究述评[J]. 唯实,2007,(2):11 – 16.
[12]陆益龙. 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145 – 150.
[13]袁松. 富人治村[D]. 华中科技大学,2012.
[14]欧阳静. 富人治村:机制与绩效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11,(5):197 – 202.
[15]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6]杜姣. 农民上访的阶层对抗解释[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81 – 89.
[17]杨华. 中国农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21 – 128.
[18]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9]宋丽娜. 熟人社会的性质[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18 – 124.

The Rural Class Relationship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LI T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acquaintances was regarded as a microscopic field to research of rural sectors, in which a close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 happened between classes, And in which we could do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classes, to grasp the state and the nature of the class relationship.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ymmetry, the villagers in constant communication could get the stratum cognition and location. The long and stable interaction formed because of the publicity and the mandatory from the inner value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the mechanism of class relations is realized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also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theory paradigm of the rural social stratum.

Key Words: acquaintance society; class interaction; the class relationship in rural areas; habitus of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symmetry; publicity; value of attraction